

基于相对剥夺感的旅游社区居民类型研究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1}

蔡克信 蔡溢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 成都 610064)

【摘要】:分类学与类型学是事物分类研究的两条基本路径。基于类型学的研究路径,以社会心理学中的相对剥夺感为理论基础,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社区居民的心理感知进行分析,从而构建出由双重相对剥夺者、横向相对剥夺者、纵向相对剥夺者、双重相对满足者四类群体构成的旅游社区居民类型二维模型。再以此对贵州西江苗寨景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四种理论类型均存在对应的居民群体。结合贵州西江景区的发展,分析了旅游社区居民类型分化的影响因素,并指出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心理感知具有多重影响,地方政府在目的地治理中应尤其重视对双重相对剥夺者和横向相对剥夺者的心理疏导。

【关键词】:旅游社区;居民类型;相对剥夺感;贵州西江苗寨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2-0084-08

一 引言

旅游社区居民的类型分析一直是旅游影响感知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引致人们行动的并非是现实本身,而是利益主体对现实的理解^[1]。国内外关于旅游社区居民类型的划分已经积累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如 Davis 通过聚类分析将居民划分为热爱者、憎恨者、谨慎的支持者、中立者、理性的爱好者^[2]; Ryan 的聚类结果为热情支持者、稍微恼怒者和中立者^[3]; Williams 则将其分为热爱者、愤恨者、中立者以及漠不关心者^[4]; Nadal 等将其分为发展支持者、谨慎发展者、矛盾和担忧者、保护主义者、替代发展者^[5]。在国内研究中,苏勤等将居民划分为矛盾支持者、淡漠支持者、热情支持者、理性支持者^[6];张俊英、马耀峰等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小庄村为例,将居民划分为理性支持者、矛盾支持者、热情支持者和冷漠支持者四种类型^[7];梁旺兵等的聚类结果为盲目乐观型、理性支持型、政策支持型和悲观冷漠型^[8]。

对事物的分类研究一般有分类学(taxonomy)和类型学(typology)两个基本路径^[9]。分类学主要基于经验事实,对事物进行分类,其常用的技术为统计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聚类分析的应用^[10];类型学则主要从概念体系而非经验事实出发,对既定项目进行类型划分,通常应用思辨和理想类型方法^[11]。

¹ 收稿日期:2017-09-10

基金项目:国家旅游局“万名旅游英才计划”研究型英才培养项目“西部地区乡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及其治理研究”(WMYC2015107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蔡克信(1986—),男,安徽六安人,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社区治理;蔡溢(1986—),男,贵州毕节人,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社会变迁。

已有的分类研究成果为深刻认识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及态度提供了有益的积累，但由于现有成果基本都是采用以聚类分析为主的分类学路径，往往只能较为静态地揭示某一旅游社区某一时间截面上的有限经验事实，故存在以下几点研究不足。一是基于聚类分析的居民类型划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不完全性，类型划分的结果受到所调查的旅游地类型、发展阶段、受访者的数量等影响，可能存在有部分未被调查到的居民类型；二是聚类分析的结果往往是将社区居民划分为3至5个不同类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不同案例地之间的比较研究，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积累；三是国内外对居民的分类多是从旅游影响感知的角度予以考虑，理论依据往往较为缺乏^[12]。同时，由于研究的方法与视角较为单一^[13]，导致重复性研究较多。

分类学与类型学的研究路径各有优劣，成功的分类研究总是交替使用这两种研究范式^[14]。而旅游是一个涉及面广、交叉重叠、关系复杂的综合现象，需要跨学科的多层面分析才能逐步透过现象看清本质^[15]。因此，本文拟采用类型学的研究路径，从社会心理学的相对剥夺感理论视角出发，对旅游社区居民进行分类研究。本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有研究视角单一的不足，丰富了旅游社区居民类型划分的理论成果。

二 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一）文献回顾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 RD)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与参照群体比较而感知到自身处于不利地位，进而体验到愤怒和不满等负面情绪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绪体验^[16]。“相对剥夺感”一词最先在《美国士兵》一书中提出；后来，墨顿(Merton)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对这一概念加以系统阐释，并发展为一种关于参照群体的行为理论^{[17]331-390}。

经典的相对剥夺理论认为，相对剥夺是社会比较的心理过程^[18]。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弱势群体成员体验到一种权利被剥夺的感觉，进而产生不满、愤怒、不公正感等情感。这种相对剥夺感既可能来源于客观存在的社会不公正，也有可能源自于弱势群体成员的错误认知或不切实际的预期。因此，相对剥夺与绝对剥夺并不相同，其最大差异在于相对剥夺与自身利益的实际增减并无直接联系，关键在于选择比较的参照群体，比较自身利益的增加速率与参照群体利益增加的速率^[19]。

相对剥夺感有横向与纵向之分。以往的相对剥夺感研究主要关注于空间维度的横向比较，比如王宁通过对退休老人有关医疗保障体制转型体验的质性研究，提出了“纵向相对剥夺感”的概念^[20]。即个体不仅仅将自己的某种状况与他人进行横向上的比较，还会将自己的状况与过去状况相比较。时间与空间不同维度的比较，深化了相对剥夺感的概念内涵，同时也使相对剥夺感更具有理论解释力。

旅游领域中，虽然关于相对剥夺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极为少见^[21]，但事实上，在社区参与等相关研究中，已有部分学者指出了相对剥夺感在旅游社区中的存在。如Seaton以古巴为例，指出旅游地居民在主客互动以及社区内部交往的过程中存在三种相对剥夺现象^[22]；左冰在对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博弈和均衡分析中也指出，越是不发达的地区，旅游地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23]。

相对剥夺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理论，其理论出发点在于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中。旅游社区居民的感知同样深受周边群体的影响。旅游业发展使旅游社区不断分化，不断增加的社会经济差异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比较。有学者指出，以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为主导的现有研究成果，在分析人们对某一事物的感知和态度形成时，是从自身的社会交换行为和社会共识出发的，而相对剥夺理论则是从社会比较的角度，可为旅游感知研究提供一种补充性的分析视角^[24]。因此，基于相对剥夺感理论展开旅游社区居民类型分析，不仅可以进一步拓展社区居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也有助于更为深刻的掌握不同群体对旅游的影响感知。

（二）模型构建

相对剥夺是社会比较结果的一个方面，其另一面则为相对满足(relative gratification, RG)。即个体在与参照群体进行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体验到一种有利的地位与认知，进而获得相对满足的心理^[25]。因此，相对剥夺与相对满足均是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结果某种程度的反映，是连续的统一体，“相对剥夺—相对满足(RD-RG)”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个体社会比较后的心理感知状态。

基于此，应用横向(空间)与纵向(时间)的比较维度以及“相对剥夺—相对满足”的不同比较结果，对社区居民的心理感知进行分析，便可构建出社区居民的四种类型，即双重相对满足者、横向相对剥夺者、双重相对剥夺者、纵向相对剥夺者(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相对剥夺感的社区居民类型划分模型

以上社区居民四种类型划分是一种理想的理论模型，四种类型在现实的旅游发展实践中不一定全部存在。由于旅游地不同的发展阶段或不同的发展模式等，在一个旅游社区可能仅存在四种类型中的两种或三种部分类型。

三 实证研究

(一) 案例地的选择

西江苗寨处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境内，由平寨、羊排、东引、南贵等自然村寨构成，是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区。西江苗寨自 20 世纪 80 年代便开始发展旅游业，为迎接 2008 年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西江的召开，地方政府开始主导西江苗寨的旅游开发，自此西江旅游发展进入快车道，并成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重要代表。

以贵州西江苗寨为案例地主要基于三个选择。一是西江千户苗寨规模庞大，旅游社区居民较多，由于社区内居民旅游参与的程度不同，获益差异较为明显；二是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的起步时间较早，在长时间的旅游影响之下，社区居民分化较为显著；三是课题组先期已对西江苗寨景区展开相关研究，在田野调查方面具有较好的可进入性。

本文课题组于 2017 年 7 月 16-31 日在西江千户苗寨展开田野调查，以深度访谈为主要形式。本次调查共访谈对象 23 位，其中男性 11 位、女性 12 位。受访的社区居民广泛分布于平寨、南贵、东引、羊排等各自然村寨。受访者的基本特征详见表 1。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您认为旅游发展之后，现在的生活水平相比以前如何？”“您认为您的家庭生活水平与景区内其他家庭相比如何？”“您认为景区内部的发展差距大不大？”“您对现在的家庭生活是否满意？”。

表 1. 受访者基本特征

编号	性别	村寨	职业	编号	性别	村寨	职业
A	女	羊排	纪念品经营	M	男	羊排	小吃摊老板
B	男	南贵	客栈老板	N	女	羊排	客栈老板
C	男	南贵	客栈房东	O	女	平寨	在读大学生
D	女	平寨	旅游摄影	P	女	南贵	客栈老板
E	女	东引	早点铺老板	Q	男	平寨	木匠
F	女	东引	旅游公司职员	R	女	平寨	在读大学生
G	女	羊排	早点铺老板	S	女	平寨	非遗传承人
H	女	平寨	客栈房东	T	女	南贵	事业单位职员
I	男	羊排	米粉店老板	U	男	东引	退休小学教师
J	男	羊排	餐馆老板	V	男	东引	小吃摊老板
K	男	羊排	客栈老板	W	男	羊排	小学教师
L	男	平寨	纪念品经营				

(二)居民类型

1. 双重相对满足者

双重相对满足者不仅与自己的过去状况相比具有很大的改善与进步，与同时期的其他群体相比，也处于一种较为有利的心理感知。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南贵村以及平寨村的临街居民，由于占据独特的景区核心游览区位优势，无论是利用自有房屋进行经营或出租，均可显著改善家庭生活。如平寨村临街的社区居民，仅出租一楼铺面，年租金即达 10 万元左右，而南贵村的一栋家庭客栈出租，年租金少则十万元，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因此，南贵村与平寨村的临街居民是西江景区内旅游经济收入最高的群体，也是景区双重相对满足者的主要群体。

如平寨村的 S 婆婆就是典型的双重相对满足者。由于 S 婆婆家的住房临街，其一楼的房屋出租作商铺用，月租金约一万元。在论及旅游发展前后的生活时，她说到：“以前种地砍柴，根本没有零花钱，以前好多人家盐巴都吃不起啊！”（2017-07-25-XJ-S①）不仅相对于过去，S 婆婆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即使相对其他社区居民，一万元左右的月租金收入也是远高于多数社区居民，在西江景区内属于高收入群体。

同时，羊排村少数村民依靠自身的经营能力，也跻身于双重相对满足者类型中，如利用自有房屋经营家庭客栈的羊排村 N 女士。N 女士的家庭客栈处于羊排村半山位置，有 4 层楼共 13 间客房。虽然客栈并不占据区位优势，但是以低廉的价格和热情的服务提高入住率，仍然能够在众多的客栈中维持生存。

N 女士在论及过去的生活时，“穷”、“辛苦”成为提及频率最高的词。她说：“以前带两个孩子在广东打工，好辛苦的”，“以前就很穷啊，油都没得吃啊，现在能过得好点”；而在谈到现在的生活时，N 女士表示较为满意：“现在客栈毛利润一年有 10 万元左右，老公是水电工，平时做点活路，加上旁边银器店的租金，生活也能过啦。以前我们客栈装修还找银行贷款 10 万元，不过两年就已经全部还清了。”（2017-07-22-XJ-N）

2. 横向相对剥夺者

横向相对剥夺者虽然比过去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与他人相比，却有一种处于较为不利的弱势地位的感知。在西江千户苗寨的调查中，发现横向相对剥夺者类型居民广泛存在，占旅游社区居民的比重最高。尤其是羊排村与东引村的居民，是主要的横向相对剥夺群体。

在访谈中，羊排村的 J 大爷和东引村的 E 女士就是典型的横向相对剥夺者。羊排村的 J 大爷认为：“我们这边是游客要看的风景，所以政府说要保持原生态，不能动，让我们给游客看。给游客看的话我们这边就不能改造，他们（南贵村）那边找钱，我们这边不找钱，他们（南贵村）吃肉，我们喝汤，让我们有点被卖的感觉。”（2017-07-21-XJ-J）而东引村的 E 女士认为：“我们西江就是穷的穷的要死，富的富的要死，南贵和平寨现在都发展起来了，就剩下我们羊排村和东引村最穷。”（2017-07-19-XJ-E）羊排村的居民认为“有点被卖的感觉”，就是在看到南贵与平寨通过旅游致富之后，自己却只能“保持原生态”，对于严重滞后于西江旅游的发展体验到明显的心理失衡。

3. 双重相对剥夺者

双重相对剥夺者即不论是与过去的自己相比，还是与同一时期的他人相比，均处于一种不利的相对剥夺地位。即居民个体的相对剥夺感在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上产生了叠加，这种叠加效应的存在使得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尤为强烈，并明显表现出对当地旅游业发展以及景区公共管理部门的不满。虽然旅游业的发展为西江多数村民带来了生活福利的改善，但是也存在少数双重相对剥夺者类型居民。在本文的调研中发现，双重相对剥夺者主要为平寨村内部缺乏旅游参与机会和经营技能的失地社区居民。

如平寨村的 L 大爷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他说：“我们一家五口人，住在一栋房子里，房子太小了，根本没有多余的房屋出租，而且我们家房子又不临街，也没有人愿意租。”在论及与过去生活的比较时，他说：“以前生活虽然困难，但是吃饭不用愁。现在家里田地早就没有了（2008 年被征收），吃饭生活全部都要花钱买。”接着，L 大爷向笔者讲述了家庭生活的窘境：“就算是按照每人每天 10 块钱的最低生活标准，每月生活支出也有 1500 元，另外还有水电气费，人情往来，娃娃读书……。我都七十多岁了，要不是生活困难，也不用在这里摆摊卖点小东西，还卖不到钱。”（2017-07-22-XJ-L）

可以看出，在丧失了田地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后，由于缺乏必要的旅游参与技能，平寨村内部的部分居民不得不承担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其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因旅游业发展得到提高，反而由于景区内部的物价上涨而呈下降趋势。

4. 纵向相对剥夺者

纵向相对剥夺者虽然与他人相比较具有优势地位，但是与自己的过去相比，反而呈现出某种处境不如以前的心理感知。在西江的调研中，笔者发现部分旅游参与较早的社区精英是纵向相对剥夺者类型的主要群体。但这种不如前的纵向相对剥夺往往是经济层面的，其家庭整体生活水平并未呈现出明显下降。如参与旅游较早的南贵村某客栈老板 P 女士就属于此类型。在访谈中，她说：“现在西江这里的生意不比以前好做了。以前一年可以挣到七八十万的，现在就不行了。尤其是今年，生意特别差，好多客栈老板都在微信群里面说，今年怎么赚房租哦。”（2017-07-25-XJ-P）

从西江苗寨的实证研究中,可以看出本文所划分的旅游社区居民四种理论模型,在西江景区内均有存在。其中,双重相对满足者主要是景区内核心区域、具有较多旅游参与机会的社区居民,如南贵村以及临街的平寨村村民,在社区中占比较少;横向相对剥夺者主要是旅游参与机会较少的非核心区域居民,如羊排村与东引村社区居民,在社区中占比最高;纵向相对剥夺者主要是少数参与旅游较早的社区精英;双重相对剥夺者主要是平寨内部少数失地且又缺乏旅游参与技能的居民。如将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与地理区域相对应,则如图2所示。



图2.西江苗寨景区不同旅游社区居民类型对应的居民群体

(三)社区居民类型分化的影响因素

西江景区社区居民的类型分化是如何产生的?从图2中可以看出,除了纵向相对剥夺者群体外,其他类型的社区居民往往与一定的地域空间紧密相连。因此,西江苗寨的社区分化是基于空间基础上的利益分化,即在旅游的激活下,原本生活的空间细分为能产生不同利益程度的空间^[26]。而从西江苗寨景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影响社区居民这一类型分化的,除了旅游社区居民自身能力差异之外,还有另外两点重要因素的推动: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

1. 市场导向因素突出了平寨村的核心地位

在2009年之前,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作为开放式免门票景区,游客以散客及自驾游为主。散客的停留时间较长,且相对而言客流在景区内的分布较为均衡。虽然沿白水河区域是景区的核心游览区域,但其核心地位并不突出,且游客的住宿也较为分散。笔者在羊排上村后山的调研中发现在少数农家的门头仍然张贴着已经剥落的由雷山县旅游局及雷山县卫生局2002年时认定的“旅游接待户”的标识,而如今鲜有游客光顾。由此可见,在收取门票之前阶段,旅游在西江千户苗寨的渗入广度远高于现在。

在实行封闭化的收票模式之后,客源市场结构的巨大转变也带来了西江景区内利益格局的较大转变。随着大量团队游客的不断进入并占据主导地位后,古街、游方街及白水河的核心游览地位不断凸显,而靠近羊排、东引村半山上的游客,随着山坡高度增加依次递减,羊排与东引的边缘地位不断被强化。除了少数散客登山直寻鼓藏头[®]家参观游览外,团队游客短暂的停留时间,使其游览活动空间难以逾越古街至白水河之间的狭小区域,缺乏游客的到访更进一步加剧了羊排村、东引村商业价值的贬值。

因此,与山脚下热火朝天的旅游商业相比,半山之上却显得冷冷清清。旅游也只是山脚下的旅游,而非西江的旅游。在笔者的访谈中,众多羊排村和东引村的村民都表达了如下类似的观点:“这个旅游开发和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山下的是很有钱,但是我们山上的还是一样很穷。”(2017-07-23-XJ-M)

政策导向因素突出了南贵村的商业功能

地方政府对西江苗寨景区传统景观风貌的保护造就了“景观区”与“商业区”的功能差异。由于观景台在南贵村，因此，处在对面半山坡的羊排村及东引村成为被游客观赏的区域。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被观赏区的传统建筑风貌，对于羊排村及东引村的房屋改造及建设管制较为严格，而对南贵村的管制相对较为宽松。而政府限制了居民对房屋的扩建或新建，也就限制了房屋经营价值的实现途径。

在西江景区，房屋出租往往是增加居民家庭收入最为方便和快捷的途径。房屋不得改造则间接地意味着房屋难以成为旅游经营接待场所，传统苗家风格的吊脚楼民居也就只是旅游资源，而难以转化成旅游资产。而南贵村虽然地势较为陡峭，用地条件较为紧张，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南贵村的村民纷纷展开了房屋建设的大热潮。沿白水河岸拾阶而上，一直到观景台处，鳞次栉比全部为客栈宾馆，南贵村成为名副其实的客栈聚居区。站在南贵村观景台远望，对面的羊排村与东引村仍然保存了较为完好的传统苗家吊脚楼建筑，但站在羊排村的山顶远望南贵村，则超过 70% 的建筑都是新建建筑。

故而，作为被俯视的景观区域，使得羊排与东引村难以得到政府的批准而进行房屋的扩建或改造，以从事旅游经营；而旅游消费客流的转变，又使得羊排与东引村房屋缺乏商业经营价值。由此使得羊排村与东引村成为西江景区内旅游利益流向的边缘地位。

此外，即使处于核心区域的平寨村也并非铁板一块。平寨村的多数耕地早在 2008 年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时即被征用，在丧失了田地的生活保障之后，平寨村内临街的房屋依靠出租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而没有临街的房屋同样如羊排、东引村一样难以实现经济价值的变现。正如平寨村内的一位木匠所言：“我们平寨村也有好几百户，富的只有沿路边的几户人家，我们大多数还是一样的。就像这个锅一样，只有这外面的一圈沾上旅游富起来了，我们里面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善。”（2017-07-25-XJ-Q）

因此，平寨村内部少数失地农民，在缺乏旅游参与技能以增加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不得不承受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等旅游负面影响，从而无论是在与他人，还是与过去的比较中均呈现出较大的落差和心理失衡，在市场与政策双重作用下，沦为景区内的双重相对剥夺者，如上文中的 L 先生。

可见，在很多周边的乡村居民看来，旅游业的发展让西江成为了天堂，似乎西江的村民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坐等收钱。然而，由于政策引导及客源市场结构的转变等，旅游利益在西江各自然村寨内的分配具有较大的差异。在西江的村民看来，旅游也只是发生于南贵村与平寨村，因为地势较高的羊排村与位置相对较为偏僻的东引村难以从旅游中获益。因此，南贵与平寨才是西江旅游的核心。然而，即使是在狭小的平寨村内部，也仍然面临着利益分化严重、收入差距巨大的问题。在平寨村内，一条街或一道墙往往就可能是不可逾越的贫富分界线，关键在于家庭房屋是“线”里面还是在“线”外面。

四 研究结论与启示

相对剥夺感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27]。一定程度的相对剥夺感有助于增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发展，但同时也不可忽视相对剥夺感的负面影响。相对剥夺感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一种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一旦转化为行为的动力，就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19]，且易引发相关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旅游社会冲突^[28]。甚至有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每增加 1 分，集体抗争的发生比增加 7%^[29]。故而，在旅游业全面而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基于相对剥夺感的理论视角对社区居民的类型进行分析，不仅可以深化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还可以为旅游目的地社区治理提供重要借鉴与参考。

（一）结论

本文采用类型学的研究路径,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相对剥夺—相对满足”(RD-RG)的视角,从时空的维度构建了社区居民的四种理论类型,并基于贵州西江苗寨的实证研究,发现四种理论类型均存在对应的居民群体。其中,横向相对剥夺者类型居民数量最多,虽然支持旅游业发展,但对旅游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双重相对剥夺者虽然数量较少,但对旅游业及公共政策的不满程度最为强烈;双重相对满足者和纵向相对剥夺者类型居民对旅游发展及公共政策均有较高的支持度。

与已有旅游居民类型的相关成果不同,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类型学的研究路径,弥补了当前单一的分类学研究路径的不足,进一步拓展了旅游社区居民类型研究的视角;二是本文的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聚类分析仅能反映某一时点上有限事实的不足,为不同案例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即使不同发展模式、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景区,均可采用本文的社区居民类型框架展开分析,进而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积累。

(二) 启示

1. 社区内不同类型居民的分化是旅游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30]。然而,在旅游发展实践中,受多种因素影响,旅游社区内不同居民的获益往往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其中不同类型居民群体的分化正是这一不平衡发展的重要产物。协调和均衡社区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31],而基于相对剥夺感的居民类型研究无疑为协调社区利益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

2. 地方政府部门应加强对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心理疏导。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公共治理目标理应包含调节民众社会心理、提升民生幸福指数^[32]。虽然相对剥夺感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有研究指出,贫富差距的扩大带来的边缘成员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对公民参与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影响^[33]。因此,从旅游目的地治理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地方政府应注重对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心理的疏导。

3. 双重相对剥夺者和横向相对剥夺者是旅游社区治理中的重点关注对象。在本文构建的四类社区居民中,双重相对满足者作为旅游社区内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旅游业发展及旅游公共政策往往最为拥护和支持。纵向相对剥夺者虽然处境不如以前,但总体上在社区内仍处于精英地位,且具有较好的自我调节机制。而恰恰是不满情绪最为突出的双重相对剥夺者和分布人数最为广泛的横向相对剥夺者需要引起地方政府部门的重点关注。如前文所述,他们的相对剥夺感部分源自于客观的生活水平的降低或停滞,部分源自于错误的主观认知或过高的预期等,故在旅游社区治理中,地方政府部门可通过强化旅游技能培训、增加旅游参与机会、增进公共政策实施的透明程度等多种途径,一方面增强相对剥夺群体的价值创造能力,另一方面对居民群体的价值期望进行管理和引导,双管齐下疏导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提高边缘居民群体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进而促进旅游社区的社会整合。

虽然本文提出了新的旅游社区居民类型划分模型,为多案例的比较分析提供了框架,但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本文仅对西江苗寨景区展开实证研究,故多案例地的比较分析成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KLANDERMANS B.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mparisons of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J]. Sociological Forum, 1993, (3):383-402.

[2]DAVIS D J, ALLEN R C. Segmenting Local Residents by Their Attitud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oward Tourism[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8, (2):2-8.

-
- [3] RYAN C, MONTGOMERY D. The Attitudes of Bakewell Residents to Tourism and Issues in Community Responsive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1994, (5):358-369.
- [4] WILLIAMS J, LAWSON R. Community Issues and Resident Opinions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269-290.
- [5] PEREZ E A, NADAL J R. Host Community Perceptions: A Cluster Analysi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4):925-941.
- [6] 苏勤, 林炳耀. 基于态度与行为的我国旅游地居民的类型划分——以西递、周庄、九华山为例[J]. 地理研究, 2004, (1):104-114.
- [7] 张俊英, 马耀峰, 陈蓉.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乡村旅游地居民类型划分——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小庄村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3, (4):204-208.
- [8] 梁旺兵, 魏欣.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民族地区居民聚类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70-76.
- [9] REBECCA G. Typologies and Taxonomies: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fication Techniques[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6, (4):328-329.
- [10] DONALD C H. Taxonomic Approaches to Studying Strategy: Som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4, (1):27-41.
- [11] TUAN N T.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Classification[J]. 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 2010, (23):237-250.
- [12] 韩国圣, 张捷, 黄跃雯, 钟士恩.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自然旅游地居民分类及影响因素——以安徽天堂寨景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12, (6):110-116.
- [13] 赵玉宗, 李东和, 黄明丽. 国外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 2005, (4):85-92.
- [14] 雷家彬. 分类学与类型学: 国外高校分类研究的两种范式[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1, (2):110-118, 124.
- [15] 王莉, 陆林. 国外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综述及启示[J]. 旅游学刊, 2005, (3):87-93.
- [16] 熊猛, 叶一舵. 相对剥夺感: 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6, (3):438-453.
- [17] (美) 罗伯特·K·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 唐少杰, 齐心,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 [18] ZHANG S W, WANG E P, CHEN Y W. Relative Deprivation based on Occupation: An Effective Predictor of Chinese

-
- Life Satisfaction[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1, (2):148-158.
- [19]郭星华.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 (3):71-78.
- [20]王宁.相对剥夺感:从横向到纵向——以城市退休老人对医疗保障体制转型的体验为例[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4):19-25.
- [21]王剑, 彭建.相对剥夺视角下的旅游地社区居民态度研究[J].生态经济(学术版), 2015, (2):34-40.
- [22]SEATON A V.Demonstration Effects or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Pressures of Tourism in Cuba[J].Progress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1997, (3):307-320.
- [23]左冰.分配正义: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博弈与均衡[J].旅游学刊, 2016, (1):12-21.
- [24]王剑, 彭建.旅游研究中的三种社会心理学视角之比较[J].旅游科学, 2012, (2):1-10.
- [25]SERGE G, ST PHANE D, AUPY A.Social Identity, Relative Group Status and Intergroup Attitudes:when Favorable Outcomes Change Intergroup Relations...for the Worse[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2, (6):739-760.
- [26]谢小芹, 戴黔.族群内部的分化及“分化秩序”的一般化逻辑[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1):820-830.
- [27]王思斌.“相对剥夺”与改革环境的建造[J].社会科学, 1988, (3):32-37.
- [28]蔡克信, 潘金玉, 贺海.利益、权力和制度:旅游社会冲突的成因机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48-55.
- [29]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J].社会学研究, 2006, (3):98-134.
- [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017-10-27.
- [31]申丽娟, 陈跃.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障碍及其内源式破解[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118-123.
- [32]刘芷含.政策变迁下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及其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 2017, (5):102-108.
- [33]周方治.群体性事件的结构动因、传导机制与化解路径——基于社会分层模型的结构分析[J].探索, 2014, (6):162-167.